

生命的主旋律

——曲啸的生活道路



辽宁人民出版社

生命的主旋律

——曲啸的生活道路

本社编



辽宁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沈阳

生命的主旋律

Shengming de Zhuxuanlu

——曲啸的生活道路

辽宁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锦州印刷厂印刷

字数：65,000 开本：787×960¹/₃₂ 印张：4

印数：1—26,000

1984年8月第1版

1984年8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李春城 插图：黄光辉

封面设计：刘 琥 责任校对：张金英

统一书号：3090·706

定价：0.33元

编辑说明

曲啸同志是辽宁省营口市教育学院的讲师。一九五七年大学毕业时被错划为“右派”，十年动乱中又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判刑二十年，投入监狱。

一九七九年平反出狱后，他曾以《任何挫折也动摇不了我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为题，先后在营口、沈阳、四平、长春等地作报告数十场，听众达几十万人次。本书的第一部分就是根据录音整理的报告全文。

第二部分是根据曲啸的故事写成的报告文学《“牧马人”新传》，生动形象、真实感人。两部分各有侧重，互为补充。

第三部分是根据广大听众、读者给曲啸寄来的热情洋溢的信件编写的综合述评。从不同角度反映了曲啸的故事在人民群众中产生的巨大教育作用，讴歌了党的方针政策的英明伟大。

曲啸同志虽然遭受挫折二十余年，但他对党毫无怨言，不幸的遭遇反而更加深了他对党、对祖国无比热爱的感情，更坚定了他对毛泽东思想和共产

500110

主义的执着信仰,故本书以《生命的主旋律》为题。

辽宁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

目 录

任何挫折也动摇不了我对共产主义的信仰

……………曲啸 讲述 傅立强 夏阳 整理 (1)

“牧马人”新传……………史航 修国金 著 (55)

人民钦佩他……………修国金 史航 编写 (111)

任何挫折也动摇不了 我对共产主义的信仰

曲啸 讲述 傅立强 夏阳 整理

我想结合自己几十年的经历，谈一谈我是怎样在坎坷不平的道路上坚持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的。

我想分两个问题来谈。

第一个问题 共产主义信念给了我战胜挫折的力量

我出生在旧社会一个贫寒的知识分子家庭，是党用人民助学金把我培养到大学毕业。党的多年教育，使我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把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作为自己人生的信念。我热爱哺育我成长的党和人民，决心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

但是，人生的道路从来都不会是笔直的。即使是在我们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们也难免要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挫折和不幸。我就是这样。应当怎样认识和对待人生旅途上的曲折或不幸呢？我的体会是：人要有一个信念，就是说，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信共产主义的真理，要按共产主义道德的要求去做人。如果说，几十年曲折、坎坷的生活道路给了我一些收获的话，那么，其中最宝贵的一条，

就是要坚定自己的共产主义信念。正是这种信念，给了我活下来的力量，给了我不断奋斗的勇气。

我是一九五七年东北师范大学教育系的毕业生。毕业前夕，开始了反右派斗争。结果，在毕业以后的第八天，一夜之间，我就从一个共青团员变成了一个右派分子。当时的所谓“理由”呢？现在看来很简单。

第一条所谓“罪状”，说我“恶毒诬蔑苏联”。在苏联二十大开过以后，我们学校的大学生们进行了一场关于外交政策和国际形势的课堂讨论会。在这次课堂讨论会上，我谈了一点自己的看法。我说，苏联二十大开过以后，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到南斯拉夫进行了友好访问。这个行动本身，是和一九四八年国际情报局对南斯拉夫的决议精神不一致的。因此，我认为苏联开了二十大，赫鲁晓夫执政以后，外交政策有一些新的动向。话就说到这儿。没有想到，几个月以后，这个发言被拿到反右派斗争当中去了，说我是“恶毒诬蔑苏联”。那时候，定了一个罪名，就要挖思想根源。在批判我的时候，也挖了思想根源，这一挖，就说我有“杀父之仇”。这个所谓“杀父之仇”是怎么回事呢？一九五一年过春节那一天，我父亲在我们老家——辽宁金县被苏联人开的汽车轧死了，压死人以后车跑掉了。我家里是三口人，父母只有我一个孩子，父亲不幸死去，我和母亲当然非常悲痛。我当时已经是

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了。个人的悲痛事小，整个国际关系事大。由于考虑到这一点，所以我和我的母亲没有向任何方面追究这个问题，而且也没有向任何方面要过一分钱的抚恤金，只是流着眼泪默默地埋葬了父亲。我认为，作为一个青年团员，在一个重大不幸面前，我是按照党的教导去做的。可是，这场悲剧竟又演成了我后来的悲剧，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第二条所谓“罪状”，就是我在大学读书的时候，和我们学校一位心理学教授关系比较好。因为我是学心理学专业的，老师也很喜欢我，所以，我们之间的师生关系比较接近。可是，在反右派斗争当中，这位老教授被错划成右派了。有人叫我揭发，我仔细想了一下，这位老师从来没和我们讲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事情，我总不能因为一个人在运动当中成了批判对象就信口开河，更不能为了减轻自己的压力就不择手段地给人家加上莫须有的罪名，这是很不道德的。我拒绝揭发，这就成了“包庇右派”。

第三条所谓“罪状”，就是在反右的前一年，即一九五六年，我们东北师范大学发生了一起流氓盗窃案。女同学宿舍里进去一个小偷，作案以后，小偷跑掉了。本来这件事情应当发动群众，利用公安机关的侦察手段，把它破获就对了。可是，学校里一些人根据一位中层干部的主张，竟拿一个女学

生做人身实验，结果，使这个女同学得了严重的精神分裂症。我认为应该给这个干部以纪律处分。没有想到，这个意见提出以后，竟被说成是“坚持惩办主义”，“攻击党的领导”。

这三条“罪状”加在一起，我就被打成了右派。

在决定开除我团籍的大会上，让我表态，我是这样讲的：对组织上开除我的团籍的决定，我保留意见。但是，我也不去越级申诉。到底是怎么回事，以后再看吧！就这样，我被开除了团籍。

离开学校的时候，我手里没有钱。当时，一位教授慷慨解囊，给了我二十元钱，也给了我一番鼓励和劝慰。他说，经过几年的学习，我本来想留你做我的助教，没有想到在这件事情上失去了你。他对我说，四十年代，我们党在整风的时候，有的同志也受了一些冤枉，但是，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多年来始终和党一心一意，经受了考验，最后终于得到了党的理解。你还是有才华的，希望你很好地接受这一次考验，将来总有机会发挥你的才能。老师这些鼓励和劝慰使我很感动。我拿着老师给我的钱，离开了亲爱的母校。

开始，我被分配到辽宁省教育厅，后来又转分配到新民师范。我思想上从来没有过反党的想法。当时又只有二十多岁，所以仍然抱着大学毕业生参加工作的那种热情投入新生活。我又非常喜欢文

娱、体育活动，在学校时当过校篮球队的队长，就经常和学生们一起打球，还给他们讲些心理学方面的知识，和学生的关系是非常融洽的。学生们也都很尊重我，愿意同我接近。没想到，这样一来出事了。有一天，学校领导找我，对我说，现在学生们都管你叫老师，很愿意接近你，你这是和我们党争夺青少年哪！你这是改造态度问题！我对这个问题也没有办法解释。最后的结论是，改造的态度不老实，决定开除公职，送去劳动教养。我是这样想的：反正我没反党，教养就教养，我只有二十四岁，身体也蛮好的，到那里好好劳动几年，出来以后照样当老师。我就抱着这样一种非常幼稚的想法，带着行李和专业书，到教养院报到了。

一九五八年四月二十四日，我走进了教养院。到那儿一看，并不象我原来想象得那样简单。进教养院的第二天，就出工去耙稻田。稻田刚刚翻过，放进水，我们八个人用八根绳子，拖着一根大木头，在泥水里把地耙平。四月的早晨，天还很冷，水里还可以见到冰碴。当时我年轻力壮，还能顶得住。地头上放着一桶辣椒水，冻得抗不住了就喝上一口。艰苦的劳动使我懂得，吃大米实在是不容易啊！后来，我又到清河去修水库，到凌源修无线电厂，烧砖、脱坯这些活我都干过。白天劳动十分艰苦，晚上回去我还坚持看自己的专业书。巴甫洛夫有一句名言：“原谅自己就是堕落的开始”，我把

这句话写成条幅，挂在床头上，把它作为座右铭，用它来严格要求自己。在将近四年的劳动教养过程中，我没写过一份所谓“检讨书”。我认为，一个人应当自爱，也应当自尊，在任何情况下也不能出卖自己的人格。虽然我身在教养院，但我仍然是一个新中国培养出来的大学生。我要用自己的行动来维护大学生这个称号的尊严，而绝不能去玷污它。

我是在一九五六年结婚的。青年人恋爱、结婚这段时间，大都有过海誓山盟，那时，我们之间好话确实也说了不少。可是，由于我被打成了右派分子，而且被送到教养院去改造，对方当然不愿意继续同我结合了，就提出来划清界限——离婚。我当时抱着这样的态度：既然不能给你带来幸福，那就还你自由。所以，我就同意离婚了。当时，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刚刚出生。我向法院的人提出，我有一个出世不久的小孩，是不是能把孩子给我留下？我可以让孩子的奶奶抚养他。这位司法人员是很严肃的，他把脸一沉，厉声说道：“你是右派，还要什么孩子？给女方带走，判给女方！”我有什么办法呢？我就在“离婚判决书”上签了字。这样，我就妻离子散了。

根据我在劳动改造中的表现，一九六一年十月一日，我被摘掉了帽子，解除了教养。当时，我对自己的前途还是充满信心的。可是，当我重新回到

社会上的时候，面临的一切完全出乎我的预料。我想继续教书，没有一个学校肯要我；我想回家，但家已经不存在了。我打听到孩子的下落，是在大连的一个托儿所。这时，我这个亲生的儿子已经四岁了。我到了那里，要求看一看孩子，向保育员打听一下孩子的情况。一个岁数挺大的保育员告诉我：

“这个孩子的爸爸是个右派，死啦！”我一听，心里“格登”一下子，这个滋味太难受了。我想，既然我已经“死了”，当然也就没有必要告诉孩子了，何必因为我的出现给孩子幼小的心灵留下伤痕呢？我就含着眼泪离开了这个托儿所。当时，我母亲住在金县。老人年岁大了，身体不好，生活也没有着落，靠为果园糊纸袋维持生活，还是借人家一间小房住的。母亲当然很希望我留在她身边，但是，母亲怎么能养活我呢？更何况周围邻居投来的白眼，确实比刀子还厉害。我意识到，家乡虽好，已经没有我立足之地了。于是，我含着眼泪，告别了母亲，离开了家乡，奔向遥远的北大荒。

在黑龙江省兴安岭脚下的嫩江草原上，有一个由劳改队新建的马铃薯原种繁育场，我就在那里就业了，找到了自己的安身之处。由于那个农场是新建的，刚从蒙古买进一批野马，我就真正当上了一个草原上的牧马人，在嫩江草原上放马、驯马。我是学心理学专业的。心理学的理论告诉我们，人和动物的心理有本质不同，但是，根据巴甫洛夫条件

反射的理论，人和动物心理的基本反应方式，都是一种反射活动，这种反射活动带有共同之处。军犬、军马的训练以及杂技团对各种动物的驯养，都是利用了动物的这种反射条件。根据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理论，我在对马群的放养过程中，固定了一些信号，用各种不同信号反复强化，形成条件反射。比如，早晨开始放牧的时候，使劲“啪、啪”地甩两鞭子，每天都是这样一种声音，后来一听到这个信号，马就能按照人的意图往固定的地方跑了。晚上要回来的时候，我就使劲吹响哨子，时间长了，马听到哨音，就自动成群，准备往回走了。经过长时间的这样驯养，效果是比较好的，我和马群的感情也越来越深。后来，我驯养的这些马，一批一批套上了爬犁、大车和犁杖，开始在田间和道路上劳动，我心里特别高兴。虽然，我被划为右派分子，可是，我终归用自己的一双手驯养了一批良马，为社会主义建设出了力。

那年春节，我在马圈门口写了一副对联。上联是：“为壮马站槽头哪怕披星戴月”，下联是：

“垦荒地种土豆何惧饮露餐霜”，横批是：“乐在其中”。确实是乐在其中。因为当时我所能得到的欢乐，就是和马群在一起，精心地饲养它们，训练它们，它们也不歧视我这个右派，彼此之间关系很好。我看到自己的劳动成果，就觉得自己活着还是有意义的。

后来，大家了解到我是师范大学毕业的，有一天，一位领导找到我说：“你是不是能教书？”我说：“师范大学毕业的，本来就是教书的嘛！”这位领导又说：“咱们有些职工的孩子上学有困难，这里又没有学校，你能不能教？”我说：“这事可不行。”他说：“怎么不行呢？”我说：“我是右派，恐怕不合适。”用今天的话来说，那位领导的思想还是很解放的。他说：“没关系！咱们这里山高皇帝远，你能教，你就教吧！反正别教错了就行。”就这样，我当上了小学教师。

学校，就设在我住的那个小房间，一间干打垒的小茅草房。没有桌椅板凳，我就弄些木头一钉，桌凳就出来了。没有黑板，我就找个破铁片子抹点墨汁。买了几盒粉笔，我就开始上课了。

开学那一天，来了十三个孩子。这十三个孩子大的大，小的小，仔细一了解，得分成五个年级。我一看，这个情况可真复杂呀！按照教育理论，最大的复式班型达到四个就了不得了，这五个年级可怎么分呢？

我是这么安排的：中间学生进行复式教学，两头的学生进行单班教学。从早晨到晚间，上完这个年级，再上那个年级，上完基础课，我再领他们上体育课，教他们唱歌。体育课很有意思，夏天到河里去游泳，冬天把雪扫一扫就滑冰。别看当时学校的条件很简陋，但我们的教学是很正规的。我对整个

课堂结构、组织教学 and 教学原则的贯彻、教学方法的选择等方面，都按照教育学和心理学的理论来要求。经过几年的学习，孩子们的成绩还是不错的。在塔西地区统一考试的时候，各个年级的孩子都以平均九十分以上的成绩获得了表奖。当孩子们用优异的成绩向祖国汇报的时候，我感动得流下了热泪。我想，在这广阔的荒原上，在自己的逆境中，为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为培养革命事业的后一代，我尽了一个人民教师的职责，有理由感到欣慰。

后来，由于形势的需要，我们这个农场撤离了嫩江，人员也分散在各地。这样，我被调到辽宁盘锦一个劳改农场的小学教书，让我教小学二年级。我是师范大学的本科毕业生，我学过儿童心理学，也十分喜爱孩子，就认真地教了起来。

就在这个时候，有许多好心的同志对我说：

“老曲呀！你都三十多岁了，是不是再成个家？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对这个问题，我是这样想的：我不能给对方带来幸福，那就不必考虑这个问题。何况，在那种情况下，谁家的姑娘肯嫁给一个右派呢？所以，我对这件事情一直很冷淡。后来，有一位开汽车的工人师傅找我，要把他的侄女嫁给我。这个姑娘的条件很好。她本人是个共青团员，家庭出身是贫农，父亲是土改时期入党的老党员，她本人是农村的妇女队长，年龄比我小九岁。和我的条件一比，我就想，人家各方面条件都挺好，我